

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

Media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媒介与社会发展研究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叶晓华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本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与社会发展研究/纪莉,叶晓华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12

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

ISBN 978-7-307-09322-5

I. 媒… II. ①纪… ②叶… III. 传播媒介—文集
IV. G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9053 号

责任编辑:易 瑛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7.875 字数:131千字 插页:1

版次: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9322-5/G·2307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2008 年暑假，在经过了严格的挑选与面试之后，我与叶晓华两位老师非常幸运地获得了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学者的身份，于暑假前往美国参加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我所访问的项目主题为数字化新闻的未来教学，叶晓华老师访问的主题是美国政治。这次访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们获得了宝贵的机会对美国媒体、社会与政治进行了直观与深入的考察与探究。

回国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所见所学更好地运用到我们的教学科研之中，并能与同行进行更好的交流和学习。在美国驻汉总领馆时任总领事的白小琳女士的支持下，我们申请了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学者校友基金资助并获得成功。这是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学者基金至今运作 6 年以来，第一次以学术论坛方式在华中地区开展校友基金项目。

2009 年 9 月 28 日，由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学者校友基金资助，美国驻汉总领馆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

同承办的“媒介与社会发展”学术论坛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正式启动。我们通过这个活动邀请了6位中国赴美国国际访问学者围绕“媒介与社会发展”进行相关主题的演讲。话题涉及媒介与法律、社会、宗教、政治等多方面的关系。各位演讲者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演说，而且均将讲座内容扩展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在此处与大家分享。除此之外，在我们的学术论坛期间，美国驻华使馆副发言人施志扬先生也来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进行了一次关于美国政府与美国媒体的演讲。施志扬先生的演讲清晰地概括了美国媒体的发展脉络和网络时代美国媒体对美国政府在信息传播方面带来的挑战。本书特此将演讲翻译收录。而深感遗憾的是，论坛第一位演讲者黎军先生因为演讲内容“媒体营运中的法律风险控制——广州电视台经典案例评析”，涉及广州电视台法律文件，不便在此公开，因此无法将其演讲内容收录进来。

在这次的学术论坛活动中，这些跨学科演讲不仅极好地促进了项目校友间的学术交流，而且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不论在演讲之中还是演讲之后，相关议题的讨论都以各种方式延续。为了让这些演讲更好地发挥其学术作用与价值，以促进更为长远的学术交流，我们特在各位专家与学者的演讲基础之上，出版此书。

本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前面 6 篇为各位访问学者在此次学术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排稿先后依讲座时间前后而定。后附有 3 篇研究生论文，均为在我们的活动期间，受到我们学术论坛启发与影响，对美国及其代表的西方媒体进行的研究；并特意投稿给我们。希望我们有机会能继续开展这样的活动，吸引更多学友投入到具有国际视野的研究之中。在编辑过程中，武汉大学“传播学理论创新 70 后团队”投入了学术关注与协助，特此感谢。

再次感谢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学者校友基金的资助。愿中美两国学术交流之路常青。

纪莉

2011 年 9 月于珞珈山

目 录

传播研究的哥伦比亚学派及其批评者	刘海龙 (1)
美国演员莎朗·斯通事件的媒介话语变异分析	
..... 叶晓华 秦小辉 (33)	
论媒介融合时代微博记者的媒介使用行为与新闻伦理争议	
——一种中美比较的分析视角	纪 莉 (69)
美国政府与美国媒体	NicholasJ. C. Snyder 施志扬 (90)
政治运行中的权力与传媒	阮建平 (113)
当代美国社会中的大众媒体与宗教	夏昌奇 (127)
西方媒介规范理论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贺 程 (154)
中美媒体关于“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报道的比较分析	
——基于跨文化传播视角的考察 ...	曹博林 吴世文 (197)
论美国“媒介审判”概念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及其争议	
..... 刘晶晶 (222)	

传播研究的哥伦比亚学派及其批评者

刘海龙*

近年来传播研究出现了一个重写学科历史的潮流，有研究者将这些研究称之为传播研究的新历史。^①所谓“新”，是指打破了由施拉姆提出的，被传播理论教材确认的传播研究“四大奠基人”的神话。对这个神话的质疑由来已久，比如批评它强调美国传统忽略欧洲传统，扬实证传统抑批判传统等，然而传播研究的“新历史”强调的乃是被四大奠基人叙事所掩盖的社会语境与意识形态，比如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代表的大资本对学术研究方向的支配^②、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以研究为名实施的“心理战”计划^③，以及学术界和产业界交织构成的环境对学科体制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① Pooley, Jefferson. *The New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David W. Park, Jefferson Pooley (Ed.). *The Histo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tested memori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② Gary, Brett. *The Nervous Liberals: Propaganda Anxieties from World War I to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③ Simpson, Christopher.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化的左右等等^①。这些揭秘式的研究固然说明了“传播科学”进步叙事虚伪的一面，却并未对传播研究本身做出深刻的反思。这种知识社会学研究是站在传播研究之外观察传播研究，而对于传播研究者而言，更需要一种从传播学内部反思传播研究的视角。

中国的传播研究从引进之初便在“科学”的名义下，未加批判地接受了许多理所当然的知识。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对经验学派的评价。在传播学引进之初，因为追求科学主义和去政治化，经验学派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成为当时中国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尽管也介绍了不少欧洲的北美的批判理论，但占主导地位的学科史叙事还是经验学派的发展。^② 近年来对外交流和译介又让我们接触到相反的一套批判理论的叙事，在求新求异的同时无形之中又人云亦云地接受了批判学者的立场，简单地将经验学派看作传播研究陷入困境（如果有的话）的罪魁祸首。这导致我们对于经验学派的认识在天使化或妖魔化的两极之间摇摆，却忽略了对经验学派本身进行自内而外的反思。本文

① Morisson, David. Opportunity Structure and David W. Park, Jefferson Pooley (Ed.). The Creation of Knowledge: Paul Lazarsfeld and the Political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tested Memori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② 刘海龙：《“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希望通过解剖有关哥伦比亚学派的两种冲突的话语，清点哥伦比亚学派的学术遗产，同时也以此为例，反思学科叙事中的意识形态。

一、为什么哥伦比亚学派会成为众矢之的？

严格地说，“传播研究的哥伦比亚学派”（以下简称“哥伦比亚学派”）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或许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同事更加贴切。在拉扎斯菲尔德到来之前，传播研究并不是哥伦比亚社会学系的特长，随着 1939 年拉扎斯菲尔德和广播研究所（Radio Research Office，1944 年改名为“应用社会研究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BASR，以下简称“研究局”）的到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这个新兴研究领域的重镇。相对独立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局，不仅聚集了众多对传播研究感兴趣的研究生，如卡茨（Elihu Katz）、布劳（Peter Blau）、科尔曼（James Coleman）、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而且吸引了默顿（Robert K. Merton）、米尔斯（Wright Mills）、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勒纳（Daniel Lerner）、赫佐格（Herta Herzog）等青年学者的参与。在研究局的鼎盛时期，参与科研的有 12 ~ 20 名兼职教师和 100 多名由社会学系博士组成的工作人员。据

统计, 1937—1960 年, 该研究机构 (包括其前身普林斯顿广播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广播研究所) 共出版 52 部著作, 350 多篇文章、书摘和其他出版物。美国社会协会到 1992 年为止的 20 位会长中有 7 位在哥大获得博士学位, 其中大部分都曾在研究局工作过。^① 在这里工作过的人员并不都从事与传播相关的研究, 从事传播研究的核心人员有拉扎斯菲尔德、默顿、贝雷尔森、卡茨、赫佐格等人, 其他人员虽然参与传播研究, 但属于外围成员。

从 1937 年拉扎斯菲尔德负责普林斯顿的广播研究所开始至 20 世纪 50 年代淡出传播研究领域, 他及研究所同事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调查广播剧为何会导致社会恐慌的《火星人入侵》^②, 探讨选民投票决策的《人民的选择》^③,

① Rogers, Everett M.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 292-293.

② Cantril, Hadley. The Invasion from Mars: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an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40. 严格来说, 坎特里尔并不属于应用社会研究局的成员。事实上, 他是最初洛克菲勒基金会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的倡导者和负责人, 他推荐拉扎斯菲尔德负责此项目, 并在此期间与哥迪特、赫佐格完成了关于火星人入侵广播剧的研究。但后来因为他与拉扎斯菲尔德的矛盾, 退出了该项目。广播研究所也随拉扎斯菲尔德迁至哥伦比亚大学。从研究方法和理念来看, 坎特里尔与后来应用社会局基本一致, 所以只能勉强算作哥伦比亚学派的外围成员之一——尽管他并不是该校和该局的成员。

③ Lazarsfeld, Paul, Berelson, Bernard and Gaudet Hazel.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研究人际影响和大众传播效果关系的《人际影响》^①，参与斯托弗负责的美国陆军研究中的研究设计，默顿等人研究广播宣传效果的《大众说服》^②，赫佐格通过深度访谈研究日间广播剧听众使用与满足的《借来的经验》^③，科尔曼、卡茨和门泽尔进行的药品扩散中社会网络研究^④，勒纳等人对中东社会观念转型的研究《传统社会的消逝》^⑤，克拉珀总结性地提出“有限效果理论”的《大众传播的效果》^⑥等。

除了成果斐然之外，哥伦比亚学派还确立了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范式，即以涂尔干主义、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管理研究作为运营方式的新的研究体制。^⑦这一范式的影响甚至超出了传播研究，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其影响力之大，导致赖特·米尔斯会在

① Katz Elihu, Lazarsfeld Paul.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5.

② Merton, Robert, Fiske, Marjorie, Curtis, Alberta. *Mass Persuasi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a War Bond Driv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46.

③ Herzog, Herta. *On Borrowed Experience*.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1941, 11 (1): 65-95.

④ Coleman James, Katz Elihu and Menzel Herbert. *Medical Innovation: a Diffusion Study*.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66.

⑤ Lerner Daniel.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8.

⑥ Clapper Joseph T.. *The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⑦ Gitlin, Todd. *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 Theory and Society*, 1978 (6) .

《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将其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作为两个反面典型大加讨伐。

具体来说，这种研究范式认为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受到客观规律的支配。所谓“社会事实”^①表面上似乎依赖于不同个体的主观行动，但却独立于个体的意志而存在，并且能够通过经验的方式加以验证和解释。社会结构限制了，甚至决定了个人的感知与决策。通过说明社会外在条件与个人行动之间的客观联系，便可以预测个人以及群体的行为。当这种对于经验的信仰发展到经验主义和更严格的实证主义的时候，对于严谨的逻辑论证形式的追求便超越了待研究的问题本身，追求“科学”的事实便取代了研究者人文主义式的主观判断。这样一种研究更注重研究的“建设性”，即通过发现规律，为现实立法，给社会管理阶层提供操作性建议和措施。

经过哥伦比亚学派的努力，这种传播研究的范式显示出了明显的优越性。首先，它制造了不少程序简明、易于上手、评价标准明确的研究工具。其次，经过形式的规范，研究摆脱了早期数据的堆砌，通过文献综述和寻找数据解释的理论框架，逐渐在形式上避免了研究的“抽象

^① 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性”，具有了可累积的潜力，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最后，它可以批量高效地进行学术生产，满足高速成长的传媒产业的需求。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研究局的知识生产，它成功地改变了广播业对学术研究的无动于衷（协调业界与学界的关系，帮助业界发展正是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广播研究的原因之一^①），成功地创造了对于“实在的”数据的新型需求。这种研究范式在业界和学术界都得到认可，逐渐成为美国传播研究的主导范式，直到今天仍然占有统治地位。

批判学派在客观上也提升了哥伦比亚学派的地位。同时期几乎每位从事于批判或文化研究的主要学者都曾把哥伦比亚学派作为靶子阐明自己对传播研究现状的不满。阿多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冲突，以及阿多诺对这种追求抽象的数字和科学的管理研究批评，已经成为传播研究史上的著名公案。曾经负责《人际影响》研究中田野数据搜集和分析工作但后来与拉扎斯菲尔德交恶的赖特·米尔斯在其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把拉扎斯菲尔德倡导的研究斥为“抽象经验主义”^②。今天社会学界已经不大有机

① 大卫·E. 莫里森：《寻找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柯惠新、王宁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②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

会谈到拉扎斯菲尔德，反倒是米尔斯让每个社会学的初学者第一次听说了拉扎斯菲尔德和他的研究范式。美国社会学左派领袖吉特林雄辩的长文《媒介社会学》认为哥伦比亚学派确立的经验范式具有管理视角、市场导向和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三大罪状，而且他把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在《人际影响》中提出的两级传播认为该范式“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客观上使这本书的学术影响力提到了极大提升。^① 凯瑞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指责哥伦比亚学派，但是他对传播的“传递观”的批评和“仪式观”的推崇，皮里阳秋地抑哥伦比亚学派扬芝加哥学派^②；他反对施拉姆建构的四大奠基人神话，将传播研究追根溯源到芝加哥学派，对哥伦比亚学派作为传播研究源头的正当性提出质疑。^③ 英国的文化研究不仅认为哥伦比亚学派的效果研究

① Gitlin, Todd. *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 Theory and Society*, 1978 (6) .

② Carey James. *A Cultural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9/1989: 11-28.

③ Carey James. *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Minneapolis: Univeris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14-33; Pooley Jefferson, Daniel Czitrom, James W. Carey, and the Chicago School.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007 (24): 5.

问错了问题，而且划清了自己的受众研究与哥伦比亚学派的受众研究的界限。^①……也可以说正是这些反对者不约而同地把批评指向拉扎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学派，才显示出了后两者的重要性。

但是这些哥伦比亚学派的反对者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将问题简单化了。他们为了树立对立面，选择性地挑选证据，共同制造了一个名为哥伦比亚学派的“稻草人”，忽略了该学派的某些重要探索和贡献。本文无意为哥伦比亚学派辩护，因为它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本文想通过剖析对哥伦比亚学派的批评，悬置传播研究史上“派系之争”导致的偏见，把婴儿和洗澡水分开。通过诠释关键文本，理性地评价哥伦比亚学派的得与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健康积极的心态讨论中国的传播研究。

二、哥伦比亚学派 = 有限效果？

在人们的印象里，哥伦比亚学派对于传播学最大的贡献——抑或对批评者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提出了大

^① Morley David: 《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冯健三译，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85~90页。

众传播的有限效果理论。它既证明了宣传效果有限以及民主制度的有效，同时，在批评者看来，它也转移了对大众媒体经营者的指责，维护了既有体制。在多数传播理论教材中，都采用了魔弹论——有限效果理论——新强效果理论的三部曲结构来叙述传播研究史。哥伦比亚学派在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位置。

但是这一历史叙事始终有些暧昧。有限效果理论究竟是否被新强效果理论的“范式革命”彻底替代？如果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仍把有限效果理论作为“理论”传授给初学者？还是这么做只是出于一种对历史的爱好？如果不是，又如何协调这两种效果理论之间的矛盾？

美国左派社会学家吉特林以《人际影响》为例，认为该理论源自于严格的行为主义假设，只关注大众传播的短期的、外在的“效果”，即可测量的态度或行为的转变。这一批评反而成为调和这两种效果观的“官方”意见，即哥伦比亚学派的有限效果理论及其论证过程并没有错，关键是他们问错了问题。他们不应该把大众传播的效果定义为外在的、短期的态度和行为转变，而应该同时寻找潜在的、中长期的、认知上的转变或者不变（更为激进的批判学者甚至认为效果研究本身就存在疑问，追求可预测性规律带有强烈的管理视角，这个问题留待下一节进